



权延赤文集



红朝传奇

共和国第一代文官武将
部属子女的真实回忆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权延赤文集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红朝传奇



权延赤 著

(下)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军 中国革命家 中国革命史

(3) (1/2) 200000 付 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李明辉

权延赤文集（红朝传奇·下）

作 者	权延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00 千
印 张	86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4-04044-9/I · 729

定 价 298.00 元（全十一卷）

没跑几步，树丛里又一声枪响。

“叭！”

枪声中，警卫员身体一跳，扔了枪，像跌落的鸟一样扑倒在地。

我们却跑得更急更猛，边跑边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爸爸——”那短短的时间里真是万念跃动，似乎父亲已经不行了，因为警卫员是弹无虚发的水平。似乎父亲在血泊中报复了警卫员一枪……

“爸爸！爸爸！”

树丛里响起“二混子”和“许大眼儿”凄惨的叫喊。我已跑得头晕眼花，胸膛似要爆炸一般。听到这叫声，便又生出悲怆的一般邪劲，摔一个跟头爬起又跑，不顾一切地扑进那丛树林。

“爸爸！”我尖叫着，看清了我的父亲。他仍然坐着，我的心浮起一丝希望；但他分明坐在血泊中，又使我惊惧得近乎绝望。“爸爸！”我叫着，扑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双手紧紧捏在大腿根，皱着眉头，忽然朝我们咧嘴一笑：“不要紧。”

我们一齐“哇”地大哭起来。正哭得热闹，头上响起怯怯的颤音：“司、司令员……”

脸色苍白的警卫员，浑身颤抖地立在父亲面前。

“妈了个×的，笨蛋！”父亲低低地骂一声，便放开嗓门道：“还不给老子捏住腿！”

我们除了哭再没有别的本事。警卫员比我们强不到哪里去，大概父亲那一枪把他吓破了胆吧？他在父亲身边蹲下，那姿势像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势，抖抖地伸出双手去

替换父亲的手，捏紧父亲的大腿。

“捏紧！你的劲都哪去了？”父亲瞪一眼警卫员。

警卫员重新蹲下，咬牙切齿地捏住父亲的大腿根。

父亲吐了口唾沫。他戒烟早，没有痰，只啐唾沫，啐出去便无影无踪，找不到痰痕。

“哧啦！”父亲撕开了裤腿。我们分明看到腿上那个弹洞，不大，却血糊糊地吓人。

父亲将手指朝那弹洞里探进去，深深地，深深地探进去。黏稠的血随着他手指一次次地探入，一股股地被挤出来。父亲的神色严肃而坦然，额上却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粒，随着手指在伤口里活动时的咕叽咕叽骇人的声响，聚成条条细流顺下巴淌落到腿上。

“妈了个×的，捞不着么。”父亲骂一句，又啐一口。

“司、司令员，别、别抠了……”警卫员一副哭腔哭调。

那一刻，我们全惊呆了。父亲伤的这么重，还要打猎呀？

在这短暂的惊愕和静寂中，父亲兀自将手在弹洞里抠索，不时抠出白肉红肉，立刻又被淹没。我们呆立着，一时间感到惊心动魄。

“司令员，不能抠，快去医院吧！……”警卫员脸孔痉挛着，流着泪，哀哀地央求。

于是，我们都以新的势头放声大哭，围拢成一圈，抱着父亲哭喊：“到医院去吧！”“爸爸，快到医院去吧。……”

“孬种！”父亲皱着眉头环顾左右，“扫兴！”

他扯下裤腿上一块布，扎了伤口，扶着警卫员立起身，朝石滩里一指：“二混子，去把那只山狮子捡回来！”

父亲把手一挥，一瘸一拐地朝来路返回。嘴里兀自在骂：“妈了个×的，扫兴！本来找点瓜瓢儿就能糊住伤口……”

建军和援朝从石滩那边拾回一只嘴里仍在渗血的山狮子。我望警卫员，警卫员望山狮子。父亲中弹后仍能跃起身来打中山狮子，警卫员却误解了那一枪而扑倒在地。

至少我在惊恐之下，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和满足。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已经能够鲜明地想象出他当年的戎马生涯：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

父亲被送进医院治疗，我们先回到家里。

炊事员老王剥山狮子皮，剥到血糊糊的伤口时，我一阵哆嗦，想起父亲的伤口。我移开目光，却遇到山狮子僵痴悲凉的黑褐色眼球。又一阵哆嗦，我生出侧隐之情，不忍地说：“多可怜呀，咱们劝劝爸爸别打了。”

炊事员老王叔叔在我出世前便跟随着父亲，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说：“懂啥？你爸爸少年时就开始杀坏人。杀恶霸地主，杀土匪汉奸，杀日本鬼子，杀国民党兵，又杀美国兵。现在天下太平不能杀人了，再不叫他杀点狼狐鸡兔还算什么将军？还活不活了？”

我的喜欢杀生的父亲，负伤后一星期，就又拿了枪一瘸一拐地“出征”了……

“壮哉，上将军！”我掷笔感叹，痛快酣畅地吸掉一支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就不讲父亲走麦城？”

“因为他没有走麦城。”

“大串联时我在南京见过那幅标语。”我谐谑地朝她挤眼睛：“许和尚仓惶出逃。”

“放屁。”桑园骂得干脆痛快，“是撤退！”

那天，门卫来电话，保卫干事接过电话后向父亲报告：“司令员，有人要见你……”

“不见！”父亲吼一声，在屋里背着手继续踱步。他喜欢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特别是心情烦躁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情绪一直不稳定，时而激动，时而迷惘，时而紧张忧虑。看到他时常脸色阴郁地驻足凝神默想，我便隐隐觉得父亲在不知不觉地衰老。他的躯体开始越过结实、粗壮的界线，令人心痛地朝着臃肿发展。眼窝出现浮肿的虚肉，两腮该有棱角的地方渐渐被多余的垂肉遮掩。

但他的眼神仍是凛然不可欺的。

“是陶勇的四个孩子。”保卫干事小声补充。

“嗯？”父亲一怔，迅即朝我们挥手：“你们去，快接他们进来。”

陶勇将军是父亲的金寨老乡，同时参加革命。他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受到残酷迫害，被投入井中淹死了。他的爱人朱兰阿姨漂亮无比，风度迷人，一直是我们女孩子羡慕的偶像。她为陶司令生了八个子女，现在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都失魂落魄地跑到我家，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他们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父亲房间，立刻放声大哭：“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妈妈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

“我的部队招！妈了个×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柩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

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人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 AB 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因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

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操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

答应!”

“……”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操练!”

“……”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 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 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

“就是要转化! 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 敢来就打死!”

“……”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

“我这是军事要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 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从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掼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的!”

父亲要去看看演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口，身子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我呼喊着重，冲上前扶住了他。他脸色苍白，身体软软地靠住我。我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医生紧张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感冒。

我知道，他虽不怕死，却包袱很重，已经快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因为这不是跟国民党斗，而是大有对抗中央

之嫌。他宁死也不敢戴对抗中央这顶帽子的。

父亲病倒了。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喜也有忧。

造反派坚持揪斗许世友，决定在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周恩来亲自派调查组赴江苏，并交待说：“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是跟父亲一道进入大别山的，造反派让他回去接受批斗，大概上边也有人发了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父亲劝说：“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司令员回去了，结果很惨，被装进麻袋里打，被扔在火车厕所里，一次次批斗，受尽各种污辱，落下一身病。父亲事后曾难过地说：“那么好的一员战将，就叫这群兔崽子毁了，妈了个×的！”

记得1969年10月的一天，父亲病得很重，在房间里生起小火盆。几年前，他在严冬里还去长江打鸭子，在八卦洲上静卧几个钟头不当回事。可是现在才十月份，他已经受不住大别山的秋凉了。

我同袁鲁生、张丹义一道看父亲。袁鲁生的父亲袁仲贤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一生只介绍过两个人参加共产党，袁仲贤就是其一。张丹义的父亲陶勇，和父亲更是一道参加革命的老战友。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招了招手：“来吧，过来，坐这儿，都坐吧。”

我们在父亲的病床前依次坐下，我望着父亲，心里有

些酸楚。不因为他形容憔悴，而是感到他的精神有些垮了。他何曾用过这样沮丧的语气讲过话啊！

“唉，我年纪大了。”父亲叹着长气，伤感地望着我们，两眼暗淡，“桑园、阿胖、毛头，”父亲叫着我们的名字。阿胖是袁鲁生的小名，毛头是张丹义的小名。父亲声音沙哑地说，“现在又生病……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火葬场……”

“爸爸！”我不忍听下去，心里难过极了。

父亲用手势阻止我，严肃认真地盯紧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埋到我的父母身边。我生没有尽孝心，没办法回家，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忠孝不能两全时，我选了忠。死后不能尽忠了，我去尽孝。我要守到父母身边……”

父亲的两眼潮湿了，红润了，闭拢了。

我的眼睛也湿漉漉地朦胧了。我已经记不起奶奶的面容，却能忆起一个场面，那场面便在朦胧中浮出。

“世友，给俺买张车票送俺走吧！”被父亲接来供养在家的奶奶，清闲享福的日子没过十天，便全身难受地提出请求。

“走？去哪儿？”

“回家。”

“这儿不是家？”父亲睁大眼，有些急：“娘，是俺还是儿媳没照顾好你老人家？”

“不，你们都挺好。是俺命不好，生就受苦的命，俺实在享不了这份福啊。”

“娘，你拉扯我长大不容易，我早早参加了革命，光

是拖累你老人家，可一天孝心也没尽过。现在好了，你，你就不能让儿子尽尽孝……”

“俺那菜园子，现在……唉，还有十几只鸡鸭，世友，俺得回去，还有一担棉花没有纺呢！”

“娘，不行，俺这几天忙，没时间送你。你再住段时间吧，等我忙完了……”父亲希望奶奶多住几天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料奶奶第二天便病倒了，而且越病越重，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父亲慌了。奶奶坚持要死回老家去。父亲只好派工作人员护送奶奶回老家。工作人员回来后报告：“老人家一回到家乡，第二天病就好了，喂鸡又喂鸭，接着就上了纺车……”

奶奶再也不曾来我家。她劳作吃苦一辈子，虽有当将军的儿子，却始终连颗鸡蛋都舍不得吃，最后倒在纺车上，那车上还留有半个线穗没有纺完！

奶奶病故的电报发到部队，父亲军务在身，未能赶去诀别。他痛苦地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磕头，淌下遗憾和内疚的泪水。

我大忠大孝的父亲，在意气沮丧之际，怀疑生命不久，便庄严地向我们三个女孩子首次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实行土葬，与父母葬在一道。

多少年后，他正式向中央写了请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别无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对此，有各种不同议论。想到父亲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多数人，包括毛主席和邓小

平，都能够理解他的这一选择。

党中央派出赴江苏调查组不久，毛泽东在上海召见了我的父亲。父亲闻讯，立刻振作起来，似乎什么病也没有了。听主席身边的卫士讲，父亲在上海一见到毛主席，冲前两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磕了一个头。

毛泽东快步赶近，双手搀扶，说：“世友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样子呀？”

父亲放声大哭，诉说委屈。毛泽东主席扶他起来，抚着他宽厚的脊背说：“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这是我的意见。军队要保持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的！”

之后，毛主席将父亲接入中南海，保护起来。每谈起这段经历。父亲总要含泪嘱咐我们：“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身难忘的。我一家人世代不能忘！”

“跪主席，跪母亲，一忠一孝。”我露着咀嚼的微笑。

“父亲生在清朝，长在民国，学在少林，然后投身革命……”

“不用解释，我不但理解，而且很受感动。许司令不但传奇，而且可敬可爱。‘文化革命’中跪拜主席的可以找出许多，敢‘武装割据’的大约只有许世友将军。”

我陪同父亲回到南京山西路人和街十一号。

家被造反派彻底抄过了。院门两侧刷满“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标语，院子里像办了“大字报园地”。进楼门，迎面一条“活捉许和尚”，至于“绞死”、“油炸”、“枪毙”

更是铺满过道、地毯，涂遍玻璃墙壁。瓶瓶罐罐自然破碎一地。我抱着戳满窟窿的裙子问警卫：“你们为啥不开枪呀？”

“不叫开，这是军令。”警卫怪滑稽地耸一耸肩。

“那你们也可以拦住么，你们不是会武功吗？”

“不许动手，只许我们伸脸。”

“伸出脸去挨打呀？嘻嘻。”我笑了。

“没打耳光，只把我们的头按在沙发上，不许抬。”年轻的小警卫吐口痰，轻松地说：“害得我落枕好几天，脖子动不了。”

父亲见到了这副劫后景象没有生气，反带一脸轻松的笑，大约见过毛主席，身上没了压力缘故，脚步恢复了矫健轻捷，匆匆往屋里走，一路走一路淡淡地评论：“好么，抄的多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可以少点……”

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径直奔向厕所。那是他专用的卫生间，里面有个小橱子。我们将那卫生间又叫储藏室，父亲个人的全部财产都藏在里面，准确地说，是藏在那个橱子里。

“哎呀，糟了！”父亲一进卫生间便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一声：“这群酒贼哟……妈了个×的不得好死！”

我和警卫战士忍不住都笑了。

父亲一生，除了酒没什么财产。那储藏室的小橱子里，满满装的全是茅台酒和古井酒，在大别山时，他便惦念着这一橱酒，现在果然被抄得一干二净。父亲伤心地一屁股坐倒，不愿起来了。